

【一般論文】

不確定性與歐洲右翼民粹主義 *

阮曉眉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Uncertainty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a

by

Hsiao-Mei Jua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hsiaomei.j@gmail.com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 Most 110-2410-H-194-078 的部分成果。承蒙三位審查者及編委會的詳細審閱，提出諸多意見與評論讓我得以進一步補充闡釋，在此特別鳴謝。

收稿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23 日

摘 要

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是當代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本文嘗試以不確定性的概念，說明歐洲「民粹主義轉向」(populist turn)的現象。本文將指出，晚期現代性瀰漫對當下及未來的不安感，這種焦慮不只跟個人社經地位的客觀物質基礎有關，同時也鑲嵌在晚期現代性的集體社會心理狀態中，成為個人主觀情感的投射。民粹主義則將這種多元交織的不確定性轉移化約到對移民的敵意，以及對過去民族國家的美好想像。為此，本文章節安排如下：一、前言，提出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二、介紹民粹主義的特徵與研究，三、不確定性的政治，則說明民粹主義如何同時煽動恐懼及給予希望，以確保其權力，四、思考面對不確定性的另類選項，五、結論。

關鍵詞：民粹主義、不確定性、恐懼政治、希望政治

一、前言

兩次世界大戰及歐洲排猶的歷史經驗，讓右翼民粹政黨在戰後歐洲的發揮空間有限，進入休眠的潛藏期。這段期間，各國紛紛建立社會福利國家體制，維持經濟與社會安全的平衡，文化上強調性別、種族等差異的多元主義，政治則朝向區域整合的方向發展。1970/8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原有的經濟社會秩序受到莫大挑戰，各國為了維持競爭力，政策朝向鬆綁市場與管制，加速人力、貨物及資金流動。這導致政治、經濟及文化各層面都出現國家邊境模糊、開放的現象。隨著歐盟的成立及歐元的使用，歐洲在某種程度上進入後民族時代。這不是指民族國家的消失，而是意味單一、同質的民族國家框架已越來越難以解釋全球的治理與秩序；民族國家間不存在垂直的權力差異，而是朝向立基於平等合作，追求和平的治理模式（Habermas, 1998）。

伴隨而生的是，產業外移及國內加速機械化，造成失業率上升，而福利國家也兵臨城下，紛紛刪除或限制社會支出（Cairncross, 1997: 9）。家庭結構的變遷、女性角色的轉變、生活形態個人化以及文化多元化，不斷衝擊原有的倫理與價值體系。在這樣的局勢下，右翼民粹政黨蠢蠢欲動，進入萌芽期（Luo, 2017: 408），1980年代歐洲各國雖有零星右翼政黨的訴求與活動，但大多不成氣候，或只是維持在地方性的選舉範圍內。德國學者 Betz 對這個時期的西歐右翼民粹政黨進行研究，指出：「激進右翼民粹政黨並不只是一個短期的抗議活動，而是表達了社會轉型到後工業資本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衝突」（Betz, 1993: 663）。儘管當時右翼政黨在尚未成氣候前都能成功地被阻止，然而，他也提出警惕：「在這些條件下，我們有理由擔

心共和黨可能變成右翼極端德國民族主義情感的蓄水池」(Betz, 1990: 57)。

從現實政治版圖的變化來看，這個預言被證實了。右翼民粹政黨從戰後的潛伏期，到 1970/80 年代的萌芽期，經歷 1990 年代的醞釀期，持續發酵。2000 年之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進入茁壯期，2008 年的歐債危機，2015 年湧入大量敘利亞難民，更激化相關勢力的發展。這個勢力不僅在公共領域取得更多發言與曝光的機會，在地方與中央選舉中也屢創佳績，形成歐洲的「民粹主義轉向」(populist turn) (Elmgren, 2018: 334; Schroeder, 2020: 13)。瑞士右翼反移民的「人民黨」在 2015 年的聯邦議會選舉中贏得佳績；2017 年奧地利右翼的庫爾茨贏得總理大選，並與極右派的「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德國「另類選擇黨」也在成立數年後，於 2017 年成功地進入國會，成為第三大黨；法國也出現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訴諸反全球化、反移民及脫歐意願，雖然未在大選中取得勝利，然而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除此之外，西班牙、芬蘭、丹麥、荷蘭、葡萄牙、匈牙利、波蘭等國家也都出現形式不同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根據「歐洲進步研究與政策解決方案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and Policy Solution) 的研究 (Boros and Gergely, 2018)，2018 年約有 30.3% 的歐洲選民投票給具有民粹性質的政黨（相對於 2017 年的 26.5%）。這個趨勢引發相當多且兩極的意見。批評聲浪與支持民眾，都急速升高，相互對峙。支持者受到鼓舞，發起一波波的排外運動，營造一股移民或難民入侵的恐懼及憂慮感；批評者則憂心忡忡，擔心民粹極權主義的幽靈再度盤旋於歐洲土地上。

當然，各國既有的政治社會及經濟脈絡不同，右翼政黨也出現「路徑依賴」而有不同發展。然而，Eger and Sarah Valdez (2014)

使用歐洲社會調查資料（2002-2010）進行研究，發現目前右翼政黨基本上跟它們在 1970/80 年代的先行者不同；當代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訴求非常明顯，構成新民族主義（neo-nationalism）的政黨家族相似性。這個政黨家族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反對區域過度整合，支持反全球化的立場，並且展現出反移民、反難民的排外情緒。在右翼民粹政黨普遍具有負面評價的歐洲，這些政黨作為一種右翼政黨的功能等同項（a functional equivalent）（Berbui et. al., 2015）。在這一波的政治轉變中，人民並非抽象的人類權利（human rights）概念，也不是世界主義意義上的普遍人類，而是具體與國家與民族意識緊密連結的公民身分（citizenship）。此外，這波對國家公民身分的強調也不是從威權走向民主階段的主權在民，亦迥異於戰後第三世界國家從殖民國或外來政權中解放、爭取獨立的國族建構過程。它是在去疆界的社會統合與多元異質並存這兩股交錯的社會處境下，試圖重啟國家邊界的管控，重新肯認國族身分的人民主權的過程，展現清楚涵括 / 排除的敵我之分。

這個現象引起不同學科的關注，在一篇文獻回顧的文章中，Mudde and Kaltwasser（2018）整理四個主要的研究理想型取向：經濟焦慮、文化反挫、政黨回應與責任、激進化，並呼籲民粹主義的研究要離開自己學科的舒適圈，培養跨學科的合作與視野，才能掌握此一複雜的社會現象。本文認同這樣的看法，並且嘗試從不確定性的角度切入，回答以下這個問題：為何在期待全球和平的後民族年代裡，民族國家及人民優先的語意，會再度發生作用，進而具有政治社會經濟的重要性？我將焦點放在右翼民粹主義對於陌生人的建構與排斥情緒，以及相伴而生的國族想像。

既有民粹主義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供給面與需求面兩類，其中卻

存在兩個限制。第一、研究常會陷入單一因素歸因的傾向，無法指出彼此間交織影響的相互連動關係，以及這些因素背後共同機制；其次，過去研究雖然注意到民粹主義動員恐懼及不安的情緒面向，但傾向將此情緒跟選民在社會結構變遷中所處的客觀經濟或就業處境進行直接的關係分析，然而，越來越多經驗研究顯示，個人經濟的脆弱性高低跟民粹主義態度之間並沒有呈現出清楚可辨的圖像（Lubers and Sheepers, 2001; Elckhardus and Spruyt, 2016; Lengfeld, 2017; Bergmann et al., 2017）。這種焦慮不只跟個人社經地位的客觀物質基礎有關，同時也鑲嵌在晚期現代性的集體社會心理狀態中，成為個人主觀情感的投射而瀰漫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有鑑於此，本文嘗試以不確定性的概念來連結不同層面的因素，以說明歐洲「民粹主義轉向」的現象。不確定性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主要在說明穩定性的喪失及無可預測性，複雜性的增加讓個人及社會失去同一性，而朝向生命處境及身分認同的片段破碎化（Bauman, 1995）。不確定性的客觀處境或主觀情緒，都映照出對複雜性無可掌握與控制的焦慮感受，外在世界無法被重構或體驗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它指涉當下處境，也投向未來的不可確知性（Schmidt, 2017）。

本文的目的在於，一方面探討不確定性的多重面向與客觀處境及主觀情緒的相互交織，並指出這種不確定性及焦慮不只出現在殆危階級，也擴散到中產階級身上。另一方面在重塑「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結構中，說明在現實或想像中對現在及未來的不確定性及不安感，如何連結反菁英及排外的民族情緒，懷鄉式地將民族國家視為過去穩定的美好烏托邦，以作為面對不確定性的解方。最後，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思考面對社會不確定性的另類替代選項。

為此，本文章節安排如下：一、前言，提出問題意識與研究目

的，二、介紹民粹主義的特徵與研究，三、不確定性與民粹主義的部分，則說明民粹主義如何同時煽動恐懼及給予希望，藉此啟動涵括／排除的機制，將消除不確定性的方法激化為排除移民，重啟國家界線的管控，四、思考面對不確定性的另類選項，五、結論。

二、民粹主義的特徵與研究

（一）民粹主義的特徵

Cas Mudde (2004) 指出，民粹主義是從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獲取養分的一種時代精神 (Zeitgeist)，是一個定義當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概念 (Mudde, 2018)。民粹主義的定義十分分歧且多元，用來描述它的特徵更是高達數十種 (Mudde, 2002: 11)。這說明了將民粹主義視為一個簡單且同質概念的困難，它是「輕薄的意識形態」 (thin ideology)，¹ 以對應於完整的、厚實的意識形態 (Mudde, 2004; Stanley, 2008)。所謂輕薄的意識形態是指民粹主義「並不具備一個全面或『完整』意識形態的特徵」，反之，它可以連結不同深度且表現

¹ 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輕薄的意識形態的危險。除了區分菁英及人民之外，Schroeder 認為，民粹主義事實上具有清楚的意識形態特徵，「除了 Mudde 定義的因素外，福利沙文主義和排外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我的國家優先』的外交和貿易政策。它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而不是曇花一現」 (Schroeder, 2020: 28)。民粹主義是「厚實」(thick) 的意識形態，若只是將其視為一種「輕薄的意識形態」，那麼將會產生如下的危險：「如果把民粹主義視為『輕薄』的，就有可能忽視影響一些國家政治方向的新信仰」，Schroeder 的立場是，唯有體認到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去思考許多其他意識形態的替代方案。

形式明顯矛盾的意識形態，它本身「缺乏一個綱領性的中心而顯得擴散」，無法獨立作為一個政治的意識形態，而是與其他已形成的意識形態的互動中彰顯其本質，但也因此「在與其他更全面的意識形態共處的能力方面具有開放性」(Stanley, 2008: 99)。

儘管民粹主義無法作為自成一格的完整意識形態，研究者仍採取間接的方式，透過分析民粹主義者的觀點及語彙，來研究民粹主義的性質與特徵。這種方法是將政治人物發言或是政治文宣視為民粹主義內容的表徵，而且主要將民粹主義視為一個貶義的概念，對其進行診斷並尋找可能的解決方式。這些論點都指出民粹主義的一個共同特徵，它是一個以人民為訴求的政治社會文化方案，透過將腐敗的菁英及純潔的大眾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以強調傾聽沉默大眾的聲音與訴求的方式來爭取選民的支持，取得道德的正當性地位 (Stanley, 2008: 102; Mudde, 2004)。除此之外，Mudde 還繼續追問區分的涵括／排除機制，探詢誰被納入，誰被排除的過程與意義，這讓我們得以進一步思考人民／移民、自我與他者的區分。

區分同時也是身分認同的指認。我們看到，民粹主義的人民語意除了將腐敗的菁英及純潔的大眾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之外，它還指涉另一個重要的區分：努力守法的人民以及威脅社會秩序的外來者間的差異。在這樣的想法中，民粹主義是一種「人民與他者間的關係性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Wodak, 2015: 2)。因此，Jan-Werner Müller 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獨特的認同政治」(2016: 3)，在這樣的身分認同當中，有一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右翼民粹政治人物將對手稱為「人民的敵人」，選舉成功的結果是「人民的勝利」以及「人民意志」的展現。真正的人民也映照出非本真的他者，尤其是移民或難民等外來者。人民被設想為單一、同質且本真的，是

不同於生活在雲端的精英及非我族類的陌生人，在這些菁英所建置的制度中，一般人民的需求及心聲被漠視、壓抑。

然而，晚期現代性產生的不確定性，到底如何將人民／菁英這組區分，轉移到對可見性高的移民及難民的排斥，進行形成「新民族主義」？在這種轉移中，人民是不同於具有威脅性、道德及文化價值上可疑的移民，後者是造成社會失序與治安混亂的他群。透過以人民為訴求當中介，菁英與移民這兩個性質十分不同的群體，便集合在右翼民粹主義的訴求中，一方面反菁英所建置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經濟體制，訴求國家保護主義的經濟及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反對在這些體制下進入一般民眾日常生活領域的移民與難民，主張重啟邊界管制，對其社會福利給付或就業許可進行更多的條件限制（Jørgensen and Thomsen, 2016; Keskinen, 2016; Ennser-Jedenastik, 2018; Heizmann et al., 2018）。這也是為什麼當代的右翼民粹主義，圍繞著反移民、反難民、反全球化及反歐盟的議題進行發聲，排外訴求非常明顯。相對於「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支持一種普遍的世界觀，宣稱人權及正義應該適用於所有人類，而不是侷限在本國公民身上，因此給予難民及少數族群社會保障，便具有高度的道德及正義的正當性。民粹主義更傾向於國家「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倫理價值立場（Zürn and de Wilde, 2016），認為平等、正義及人權並非普世價值，而是只適用於特定的區域及文化圈。他們把平等、正義及人權的價值跟民族國家的公民連結在一起，並且強調民族國家的共同體不僅具有相同的文化價值，也使用共同的語言來作為團結彼此的方式。因此，為了保護共同體，必須要控管穩定的民族國家界線。倘若國家邊界開放給移民或難民，或者依照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開放貿易邊界，以及政治上進行區域整合的話，那麼，

這反而會傷害社會的生存。

（二）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

民粹主義的興起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不同學科熱烈討論的主題。當然，我們很難指出單一因素來說明此一發展的成因，這是多重複雜因素的交錯結果，彼此相互增強。各國也因特殊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發展，而有不同的差異。例如：戰爭失敗的經驗引起社會內部的不安及羞辱感，激起德國 1930 年的民粹極權主義。1970/80 石油危機，讓西歐的民粹主義蠢蠢欲動。而當代這波民粹主義則受到 2008 年的歐債危機、財政緊縮及 2015 年大量難民的移入，被激化凸顯出來。這些事件對於既存的政治秩序都造成了影響，然而，這些特定的歷史事件並不是單一的因素，而比較像是引爆點，使社會內部長期累積的各式矛盾白熱化。

針對當代民粹主義的興起，有些學者從供給面切入，研究政黨、政治人物及政治治理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例如分析民粹政黨的意識形態及修辭策略（Muis and Immerzeel, 2016; Bronk and Jacoby, 2020），以及魅力領袖的影響（Pedahzur and Brichta, 2002），或是對於現有制度治理失能進行探討。Daniel Rodrik（2018）指出，世界經濟的失敗主因不能歸咎於開放邊界與區域整合，而是在於國內治理的失敗。他指出現代的全球化是建基在一個具有危害的不對稱性上，貿易協議主要是以商業為主的議程，勞工相關的權益保障及社會政策並不是全球化談判的關注焦點，而在國內也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進而導致現代化（潛在）輸家感受到相對剝奪感的焦慮與不安。這樣的情緒一旦蔓延出來，便成為民粹主義興起的溫床。這也常被視為一種

「民主的赤字」，顯示現有的代議民主制度無法回應社會變遷下的人民訴求（Betz, 1990: 45）。在這樣的狀況下，出現治理的失能及政權的正當性危機，選民因而轉向支持承諾改變現狀的政黨及政治人物（Hambauer and Mays, 2018; Ibesen, 2019）。許多新成立或過去不成氣候的民粹政黨提供的議程與黨綱，變成為另類選擇的可能性。

除了從供給面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研究路線是從選民的需求面著手，著重在選民態度、選民特質及其社經地位。這些研究認為，即使民粹主義是特定文化及政治的產物，但是它之所以能夠取得選舉的成功，還必須能夠跟選民的觀點及情緒共振，產生共鳴。這樣的觀點認為，民眾本來就存有類似的意見基礎及心理需求，這既是民粹主義發展其政治事業的條件，也是結果。例如，Morelock ed. (2018) 從批判理論及 Adorno 有關「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的概念出發，討論偏見與民粹主義政治傾向偏好的關係。歷史學家 Köster (2018) 則指出，具民粹主義色彩的非學術性歷史雜誌，建構虛假的歷史敘述，而記者與人民的「思想怠惰」(Denkfaulheit) 致使這些歷史敘事在沒有嚴格的學術檢驗下，一再被流傳，並且以挖掘被隱藏的真相之姿，打破長期以來的歷史禁忌，助長了民粹主義的氣焰。在這樣的狀況下，Köster 轉而訴求培養個人或社會的反思能力，以擺脫這種蒙昧無知狀態。然而，這種啟蒙主義、個人主義式的解釋，並無法說明選民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心理動機，也無法解釋這個動機背後的社會文化結構條件與脈絡。

相對於此，測量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則是用來說明誰跟民粹主義比較具有親近性 (affinity)，而這樣的研究常以個人在社會結構的處境為基礎來進行。這樣研究取徑認為，廣泛蔓延在選民之中的民粹主義態度，並不能直接從政黨成功動員的語彙、修辭或選舉的席次推

導而來（供給面），反之，它透過選民結構的分析，探查經濟與文化因素如何作用在選民的社會心理及投票意向。這主要從兩個理論取徑切入：現代化的輸家及文化威脅取徑。

現代化輸家的論點從經濟及社會地位的觀點切入，來探討民粹政黨的崛起（Spier, 2010）。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解除管制，開放邊境，各國企業能夠更順利將產業移向廉價工資的國家，或是引進外籍移工。政策決策精英在促進經濟的目標下，以自由、解放之名不斷制定鬆綁法規的制度。這對國內的勞工產生很大的影響，構成社會的危機（Duménil and Lévy, 2011）。工作職業的兩極化現象越來越明顯，造就食利族及殆危族（*precariat*）兩類群體，形成資本發展中的社會政治弔詭（*sociopolitical dilemma*）。食利族是在新知識經濟的浪潮中得利的新貴階級，是一群有技術的工人，雖然人數較少，卻擁有大部分的社會經濟成果。殆危族則是生活處境困頓者，他們過去習得的技術在這個過程中失去競爭力，在勞動彈性化的政策下，容易面臨失業、貧窮或是簽訂非典型及短期的勞動契約，成為有工作的新貧族；全球化及區域整合，對他們造成負面的經驗多於正面的經驗。

現代化輸家工作處於不穩定的狀況，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依賴國家福利制度的保障。自從 1980 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在經濟層面具有深遠的影響，同時各國的福利開始市場化及私有化，轉向以工代賑的積極促進政策，縮減福利支出。不斷緊縮的社會福利支出，更加劇這些人的相對剝奪感。這些現代化輸家認為，移民或難民的湧入是他們在職場上的潛在競爭者，同時也是福利資源的潛在競爭者，逐漸浮現出一股福利沙文主義（*welfare chauvinism*）的情緒，認為移民或難民在過去並沒有繳納稅金或保險金，不能立即享有豐富

的福利資源，國家資源應該優先分配給本國公民，因此也就傾向支持國家保護主義的政治提案。

在民粹主義需求面的研究中，除了經濟分配議題引發的不滿之外，文化被視為民粹主義蔓延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傳統身分參考及價值系統受到威脅。文化上的焦慮及威脅感體現在兩個面向上。第一是現代化過程中，尤其是後傳統的時代，個人主義及多元文化對於傳統社會造成深遠的衝擊。後傳統社會展現一套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觀，人們從傳統及過去奉行的規範中解放出來，在工作、家庭約束及性別配置上都獲得自由。現代城市的規劃增加陌生人（不一定是不同種族或民族的人）在場的日常生活處境，相互的連帶關係也變得淡薄。正如 Heitmeyer（2010）所言，這是一個「被鬆綁的年代」，然而，解放與自由並不總是具有正面的意涵，而是伴隨不安全感。多元文化也被視為摧毀傳統美好的文化價值與道德倫理，使社會陷入虛無的相對主義，而且性別解放運動被譴責讓原本家庭的功能與價值傾毀，造成社會不安及青少年犯罪率提高。

其次是面對外來「異」文化的現實處境，面對這些多樣性及差異性，多元文化主義訴求差異並存的理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化的許多經驗可能轉換為負面的經驗，包括發生在一般日常場所中難以預料的恐怖行動，經濟及生活處境的不確定性，以及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念混雜交錯。這些經驗使得原有的穩定生活受到干擾，驅動著人們尋找在地的認同，企圖從中獲得安全感及熟悉感（Giddens, 1991）。隨著 2015 至 2016 年大量湧入的難民，加劇移民或難民成為可清楚指認的代罪羔羊，各國內部的公民更強烈地感受自身文化價值及生活方式受到威脅，人們覺得雖身處家鄉，卻沒有在家的自如與自在感。社會心理不可見的不安感，便容易轉為對可見

的移民的仇恨及排斥，並在排斥他者的過程中，重新建構民族自我與想像的家鄉共同體（Bauman, 2001）。

Inglehart and Norris（2016）將其稱為「文化反挫」（cultural backlash）現象，社會回頭去想像建構出一個秩序穩定、恢復傳統性別分工及較狹義民族的道德黃金年代，並將戰後的「進步」思維視為社會失序及個人生活不安的來源。這股新興政治勢力以民粹的方式掌握、甚至鼓動了選民的恐懼及焦慮感，從中獲取選舉大勝的成果。

不管從政治、經濟或文化面向切入，這些都牽涉到不確定性，然而，到底不確定如何作用在選民身上進而影響其民粹主義態度，我們卻很難找到清晰可辨的圖像。在現代化輸家的論點方面，有研究證實低教育、低技術及低所得的群體或地區，因為經濟物質剝奪狀況較嚴重，確實引發跟民粹主義傾向有較高的親近性（Rippel and Baier, 2005）。Betz（1990）也指出，社會從工業福利資本主義進入後工業個人化的資本主義，同時產生現代化的贏家與輸家。激進右翼民粹政黨的選舉策略與訴求，正好可以吸引那些失業的輸家選民。然而，也有許多研究指出兩者的關聯性不大（Lengfeld, 2017），失業率與支持右翼政黨並沒有出現預期的正相關（Lubers and Sheepers, 2001; Bergmann et al., 2017）。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經濟剝奪與民粹主義傾向的關係，並不只繫於個人客觀的經濟處境，而是個人主觀的感受、感知、相對剝奪感（而非絕對剝奪感）與詮釋（Elckhardus and Spruyt, 2016; Mudde and Kaltwasser, 2018: 1672）。換言之，感受、感知或情緒的趨向不必然跟客觀的經濟處境有關，而是對於現況或未來的焦慮與不安的心理感知。

在文化焦慮的觀點中，同樣出現經驗實證不統一的狀況。有

研究指出，文化威脅感動員了人們支持民粹主義的趨勢（Lengfeld, 2017），而且文化不安感看似為非物質的情感投射，但同時也具有物質的經濟基礎及國內制度治理失能的催化。根據 Inglehart 及 Norris 的研究，教育程度較低、過去曾是社會中產階級的人，特別容易感受到過去信仰的價值體系受到破壞與威脅，而這樣的情緒引起保守價值的反撲，強調傳統文化與價值及家庭倫理的優越性，造成文化反挫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反女性主義及反多元文化的新保守主義特徵（Bitzan, 2017; Kováts, 2017）。從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當代社會正在經歷一種「新形式的父權主義及陽剛規範和不滿的興起，以及對傳統價值傾毀的恐懼」（Fangen and Skjelsbæk, 2020: 411）。在社會及產業劇烈變遷的條件下，低教育及低技術的人面臨的衝擊是比較大的，社會瀰漫一股挫折感，人民感到無力、疏離孤寂，因為他們過去技術及價值體系受到嚴重威脅，被貶低為較不進步、傳統及保守。然而，有越來越多學者的研究指出，焦慮也普遍瀰漫在中產階級之間（Schaefer et al., 2002; Vogel, 2009; Münkler, 2010: 55; Priester, 2012: 17），而受到威脅的中產階級轉向回歸到順從、符合傳統規則的陣營（Koppetsch, 2013）。Koppetsch（2017: 3）的研究指出，感到文化受到威脅並不必然跟職業或所得狀況有關，而是人們原有世界觀及秩序失去有效性，趨向原子化，脫離原有的連帶關係；隨著現代化的推動力，人們必須跟新的價值秩序妥協，尤其是必須跟上多元的生活方式與規範，因為文化多樣性被視為一種豐富、開放及包容的價值。而過去熟悉的傳統、相對侷限在封閉共同體的行為與態度，則將這種新的世界秩序與價值詮釋為傳統的墮落與威脅，然而也無可避免地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而變得搖搖欲墜。這種文化威脅的感覺也衝擊到社經地位較穩定的人，包括收入較高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

階級 (Rippl and Seipel, 2018)。

我們看到，不管是從民粹主義的供給面（政治治理失能觀點），或是需求面（現代化輸家與文化威脅），所牽涉的都不只是客觀的社會經濟的物質基礎，而是還包括主觀及心理的感受，以及對於現象的詮釋；不確定感也不只是當下處境的反映，而是擴及對無法預測及控制未來的焦慮。Beauzamy (2013) 呼籲，若要適切地說明及理解右翼民粹主義訴求為什麼越來越具有吸引力，我們除了分析政黨及政治治理的供給面之外，在需求面上還要超越簡單的現代化輸家的經濟觀點或是文化焦慮的觀點，尤其是要超越客觀的殆危生活處境造成民粹主義態度的單線觀點。

這也說明了近幾年來，學者對民粹主義的情緒、感知及詮釋面向的研究興趣，不斷升高，藉以說明社會心理的感受、本體論上的不安全感與民粹主義的關係 (Capelos and Demertzis, 2018; Salmela and von Scheve, 2018; Kinnvall, 2019; Steele and Homolar, 2019)。情緒既是個人主觀的感受，但也具有社會文化的要素。接下來，我將以不確定性的概念，進一步說明在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變遷中，主觀情緒與個人客觀社經處境這兩個既相關又不一定統一的狀態，其牽動集體社會心理的不確定感及不安感等感知，民粹主義在其政治技術與策略中，正是動員這種不確定性，發展出恐懼政治及希望政治。透過不確定性的概念，我們將能更廣泛地將主觀及客觀的不確定性處境，一同納入討論。

三、不確定性與民粹主義

有關民粹主義的研究多數都會觸及到政經結構或文化威脅的不確定性及不安感的面向，然而，大部分都將其視為不證自明的概念。Bronk and Jacoby（2020）兩位作者雖然曾經將不確定性作為主要概念，研究民粹主義的知識型及「不確定性的政治」（politics of uncertainty），然而重點還是放在經濟物質脆弱性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上。

不確定性具有社會的條件與基礎，可能有客觀的社會經濟指涉，但從上述的實證資料中發現，它也可能是一種對當下及未來不安的集體社會心理的情緒感知，同時關涉經濟與文化面向。不確定性並不是移民或難民這些異族的陌生人出現才浮現的，而是鑲嵌在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在晚期現代性更加地尖銳化。在此，我的重點不只是指出社會結構的變遷或個人心理的狀態，也不在於闡釋社會結構的客觀物質基礎如何直線地反映在個人社會心理的傾向與態度，而是嘗試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切入，連結社會結構及氛圍與個人心理感受及情緒，藉以說明在經濟與文化面向上主客觀不確定性的多重關係。我將不確定性視為現代性以降的重要生命處境，既帶來解放自由，也帶來無所適從、無可控制與預測之感。這種正負效果的拉扯若能維持一定的平衡，社會的秩序與規範便能相對穩定地運作下去，但若是被煽動而趨向極端化的話，原有的秩序及價值系統便會受到挑戰。

（一）不確定性作為現代性的重要特徵

不確定性及未規定性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主要是指世

界秩序及價值體系不再受單一規範或軌跡的約束，而是呈現偶連（contingent）、意料之外、創新及令人驚奇的狀況，原有靜態穩定的景況被推到動態不穩定的變化中（Reith, 2004），人們「生活在碎片中」（Bauman, 1995）。事實上，不確定性一直存在生活世界中，但是從傳統社會進入到現代功能分化的社會中，這種不確定性不斷升高。這種巨變是全面性的，在政治上，民主的民族國家逐漸取得權力，取代過去的封建制度；封建莊園及氏族的經濟及社會保護功能，也逐漸被工業模式所取代；社會及個人從單一的價值與規約體系中解放出來，形成了多元文化價值體系及生活秩序（Schwinn, 2020）。過去傳統家庭氏族維繫的機械連帶團結形式，已經轉換為功能分化社會的有機連帶的團結形式；人類也趨向個人主義的原子化。這種轉變既帶來危機，也帶來轉機，既帶來自由解放，但也產生社會失序（anomie）狀況及個人孤寂感。

戰後，凱恩斯社會經濟模式建立的福利國家、各式解放運動以及多元文化的教育，讓不確定性及不安全感被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認為未來會朝向進步完善的方向發展。然而，1970/80 年代開始，凱恩斯社會經濟模式開始失效。原本作為降低社會不確定性的福利國家，現在成為問題自身，尤其他所產生的依賴文化更成為爭議所在（謝靜，2017，頁 19-20）。在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巨變及刪減社會支出的過程中，社會的不確定性及不安感再度升高，甚至對過去的多元文化及性別平等教育產生質疑，人們開始討論「風險社會」的到來。各國為了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加速全球化及其挾帶的新自由主義的思維。1970 年代各國社會內部雖然出現對多元主義及現代進步思維的抵抗，但身分及文化差異的認同政治的運動與呼聲並沒有停歇下來，反而更如火如荼地加速（Young，陳雅馨譯，2017）。

在全球化的社會中，我們被拋擲到更激烈的不確定性的境況之中。Hermans and Dimaggio (2007) 指出，不確定性具有四個特質：複雜性 (complexity)、模糊兩可性 (ambiguity)、知識匱乏 (deficit knowledge)、不可預測性 (unpredictability)。在全球化的社會中，差異漸繁，無法相互化約。社會複雜到無法透過單一價值及評斷標準來加以掌握。全球化社會也常出現模擬兩可的弔詭現象，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訴求中，常出現不知所措的相對主義。對於差異及多樣性的社會事實，現代人卻呈現了知識匱乏的狀況，無法完全掌握不同行為及慣習的文化社會意義，因此對於陌生事物，常出現迴避、甚至是嫌棄的態度。不確定性還包含不可預測性，這除了個人生命的不可預測性之外，還包含恐怖的隨機攻擊行動所造成的不可預測性及隨之而來的恐慌。這不只激起人民對於現狀不滿，同時也對未來失去信心與希望。在這種新的世界中，過去福利資本主義起保護作用的傳統制度（包括家庭、工會及國家福利制度）開始崩解，以民族國家為界線、相對同質與穩定的文化認同在多元文化的訴求下，面臨極大的挑戰。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是政治、經濟及社會相互交織下產生的激烈效果，牽動人民的社會心理認同。它牽涉到社會心理層面，指一種心靈及情緒狀態，不必然和實際的日常生活物質條件或失業與否的事實相一致，而是泛指對於現況的焦慮不安，以及無法控制未來的不確定感、無力感、被剝奪感及挫折感。全球化一方面造成了社會學家包曼 (Zygmunt Bauman) 所稱的文化同質化，而非差異並存的現象，但另一方面他也觀察到，文化與認同多元交織，混雜歧異，甚至快速聚合又消散，形成認同的液態化 (liquidation) 與流動性。這個現象是從傳統社會轉向功能分化社會的表徵之一，也是都會生活的重要特色 (Junge, 2012: 88)。本體論安全感的獲得是一種個人在建構自我時

管理焦慮的過程（Giddens, 1991; 2004）。複雜性逐漸升高的社會，意味著生命的穩定立足點與確定性不斷流失，因而衍生出本體論上的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Lebow, 2016）。社會學家 Ulrich Beck（1998）亦曾指出，在全球化及後傳統社會的進程中，世界經濟的形成以及個人主義化的發展使得民族國家漸漸失去了它原有的管轄能力及主權，社會內部的價值分歧也不斷上升。這不只是單面向地指工作位置的裁撤、產業外移、低薪或跨國企業等經濟議題，而是關涉社會、文化、認同等多層次的面向（Beck et al., 2001）。

這種隨著全球化及晚期現代性而來的社會變遷已經徹底改變了現代性的特徵，早期現代性儘管充斥著不確定性，然而透過凱恩斯社會經濟模式及多元文化主義，而仍然維持一種相對安全、確定及可預測的固態現代性，然而，隨著全球化及激烈的社會變遷，液態或流動的譬喻更適合用來說明晚期現代性的特徵，「把握現代性歷史中目前這個在許多方面都很新穎的階段的性質」（Bauman, 2002: 2）。這不僅出現在經濟處境的液態化及兩極化，進而形成了國內低技術、低教育及低所得的「廢棄人口」或被稱為「殆危階級」、「現代化輸家」、「被拋在後面的人」，同時對整體的生命處境產生莫大的影響，也因此出現液態的生活（Bauman, 2005）、液態的愛情（Bauman, 2003）及液態的恐懼（Bauman, 2006）。這種無可預測及控制的不確定感，也包含著成為潛在廢棄人口的焦慮，是具有情感面向的「存在的不確定性」（existential uncertainty）（Bauman, 2016: 17）。就時間面向而言，這不只指涉當下的不確定性，也投射出對未來風險的不安感。這樣的狀況不僅牽涉到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更觸及了後現代主義對於生命處境及文化斷裂、破碎化的診斷。固態現代性提供的安全及確定性逐漸消散，反之，液態現代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越形明顯。這部分是因為在菁英主導的政策中，社會變遷並沒有產生足夠的意義來增強人類生活的品質與心理的安穩。人們在這此液態化的波浪中，感覺到社會疏離與孤寂，失去社會連結，「由不確定主宰的液態現代性的負面效果是不安全感、焦慮及恐懼的狀態」（Bauman and Haugaard, 2008: 112）。現代社會出現大量及過剩的選擇，然而卻「缺乏可靠的路標和權威的指導」（2008: 115）。換言之，在這樣的世界上，人們被拋擲到不斷更新的時代滾輪中，然而卻也承受著成為液態社會中的「人口廢棄物」之風險，因為「安全的港口少之又少，大部分時間，信任都是漂浮在沒有錨的地方，徒勞地尋求暴風保護的避風港」（Bauman, 2000: 136）。生命處境變得十分輕盈，可隨時被替換與取代，身分認同也越來越混雜，不確定性的焦慮瀰漫在社會之中。這種不確定感不只出現在「現代化輸家」身上，而是超越特定階級範圍，擴及到中產階級身上（Klein, 2007）。換言之，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具有客觀的經濟物質基礎，卻不限於此，而可能是帶有集體社會心理的情感性根源；它不侷限在當下的不安，而是瀰漫到對未來的想像。因此，若我們只以現代化輸家或是文化焦慮來探討當代不確定性與民粹主義的關係，容易忽略了不確定性的情感面向。以下，我將討論這種不確定性如何被轉移化約到對移民的敵意，以及對過去民族國家的美好想像。民粹主義煽動的身分政治及焦慮，透過將深受存在不確定感所苦的個人，重新安放在單一的人民集體形象上，藉此與移民這個他者劃出界線。²

² 感謝評論之一，簡潔扼要地總結本文要傳達的不確定與自我／他者的關係。

（二）不確定性的憤怒與恐懼政治

晚期現代性因其混亂及複雜性而產生的普遍的不確定感，激起人們對當下及未來的不安、恐懼、憤恨及無奈感，民粹主義掌握到這種集體的不確定感，煽動這樣的情緒來獲取政治的權力，並逐漸將來源分歧、表現形式不一的不確定性化約歸咎於移民或難民身上。Ulf Bohmann/Henning Laux/Hartmut Rosa（2018）指出，在現代複雜差異的社會中，政治、經濟等領域在水平層次上各自發展出獨特的運作方式與邏輯，但彼此間仍會相互影響與干擾；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領域對同一事件的反應卻不一定是同步的。當經濟領域發生問題，例如 2008 年的歐債危機，政治領域裡的相關機構也會做出反應與調整，盡量維持不同系統間的同步性，好保持政治及社會的穩定性。然而，這些決策權主要是掌握在組織的菁英手中，這造成建制的政治機構與民主社會形成集體意志的基礎過程之間產生垂直的、時間上不同步（Desynchronisation）的狀況。而民粹主義正是利用這種菁英／人民在時間結構上垂直的不同步發展，鼓動決策菁英或建制派不再傾聽人民聲音、遠離人民需求的情緒。這種情緒及感知的操作，主要訴求主責的政治機構及其代表與廣大民眾的意志斷鉤（Entkopplung），而這是不民主的；這進一步地使代議民主陷入困境，形成所謂的「民主赤字」。然而，這並不是對民主本質的真正質疑，反而是對決策菁英階層的質疑。三位作者指出，菁英決策／大眾意志兩者的時間不同步，讓民粹主義得以「人民之名」來進行動員與操作，因此，右翼民粹主義的形成與增強可說是「政治弔詭的時間序列的結果」（Rechtspopulismus dann als Folge eines dilemmatischen „Time-Squeeze“ der Politik）。但是這裡也內藏民粹主義的時間社會學

的弔詭（das zeitsoziologische Paradox des Populismus），這是說，民粹主義以人民之名要求或承諾快速回應人民的需求，然而，快速反應與行動卻可能規避政策取得正當性所需的公共意志與意見討論的冗長過程，降低了菁英所做決策及市民審議過程的來回磋商，而這無疑加劇民粹主義煽動的菁英 / 民眾鴻溝漸來漸深的怨恨與憤怒，民主可能因此遭受到從內部而來的威脅，犧牲國家及民眾間縱向的同步性。

除了煽起憤怒之外，不確定性也帶來不安、恐懼與焦慮。Bronk and Jacoby（2020）注意到這是民粹主義得以操作其民粹主義的知識型、敘述及技術的社會心理基礎。他們兩位指出，民粹主義情緒的分佈透過操弄不確定性及未規定（indeterminacy），不斷激化選民心中的懷疑、迷惑、恐懼及焦慮，來確保政治權力。這也是為什麼 Ruth Wodak（2015）稱民粹主義為「恐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這不一定是基於事實，而是鼓勵一種「對事實進行部落式的建構」（the tribal construction of facts），而這樣的影響是會擴及到不同的團體。這也是為什麼民粹主義的情緒層面不一定與個人的客觀社經地位與處境。這也呼應了 Mark Elchardus and Bram Spruyt（2016）的研究，兩位作者發現，支持民粹主義並沒有直接跟較弱或不確定的經濟處境、對於個人生活或是失序感覺有關。對於民粹主義的支持看起來是對於社會整體負面發展的想法之結果——衰弱論（declinism）——並且感覺自己屬於一群被社會不當對待的人有關。換言之，經濟或個人生命不穩定的人或是低教育程度的人較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假設，在經驗上不斷被挑戰。這顯示了，經濟的脆弱性並不是直接關聯到民粹主義的態度，而是透過對於這種脆弱性的詮釋與感知的中介；人們詮釋自身的處境，所反映出的並非社經地位上的絕對剝奪感，而是對於當下及未來不安，以及相對於過去而言的相對剝奪感。社群媒體在催化不

確定性的憤怒、不安及焦慮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傳遞「情緒性風格的訊息」(emotionalised-style messages)，這種訊息具有快速、即時及煽動性；民粹政黨使用媒介，以情緒性的表達來尖銳化人民與精英及他者的對立，攻擊對手，這加深同溫層的效應，使得政治不斷走向極端化 (Bobba, 2019; Bauman, 2016: 107)。

Mikko Salmela and Christian von Scheve (2018) 同樣是分析民粹主義的不確定性及其觸發的情感面向，他們兩人指出，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研究選民在當代社會中面臨的恐懼及不安全感，或是怒氣、怨恨及仇恨。然而左翼與右翼之間的情緒是不同的，左翼及右翼民粹主義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情緒機會結構，右翼的是被壓抑的羞愧感，擔心自己的能力被取代，在現代化的競爭中被淘汰，這不僅夾雜著不安，也意味著壓抑著被控訴能力不足的羞愧感；左翼的民粹主義則是一種是公認的羞愧感，轉向對新自由主義的既得利益者、菁英及其所代表的體制與思維的反抗。兩位作者認為，正是因為左右民粹主義之間情緒機會結構的差異，使得左翼的民粹主義具有解放的潛力，而右翼民粹主義則將這種不確定性、反建制及反菁英的情緒，大大地引導對移民與難民的排斥上。Tereza Capelos and Nicolas Demertzis (2018) 的研究也呼應這樣的看法，在不確定不斷升高的時代，憤怒、恐怖及希望等情緒是與個人效能 (perceptions of self-efficacy) 的感知有關，這些情緒匯集為不滿、不平或是充滿憤怒的怨恨情感的混合複雜狀況，而這會轉過來影響公民政治投入的路徑，甚至是暴力且非法的政治行動。正是這樣的情緒可以用來理解政治的發展，懷疑論者感受到委屈，激起反移民、反建制及反專家的情緒，以及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

從反菁英、反建制到反移民，這並不是一條必然的發展軌跡，

然而，移民與難民因其可辨性及易於指認的特性而具有雙重的可見性，很容易被視為全球化及社會變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代罪羔羊，成為「過剩痛苦所瞄準的清晰可見的靜置標靶」（Bauman，古蕾、胡欣譯，2018，頁 130）；他們是「秩序崩毀的體現」（Bauman, 2016: 15）。這麼一來，國內階級、性別、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對立關係，便被導向國外界線的劃分，這也就是 Rydgren（2007）觀察到，右翼民粹政黨操作不確定性，將問題歸咎於外人，尤其是種族、文化、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迥異的「陌生人」，因此，針對菁英及建制派等國家之內的敵人，被導向集中在移民或難民這些國家之外的敵人，這成了一種「在政治上迅速擴大的心理狀態」（a politically explosive state of mind）（Bauman, 2016: 4）。甚至人們也無法看清晚期現代性造成的個人孤寂感、失連帶及去個人化的異鄉人感受，是新舊社會力量相互衝突所造成的現實斷裂感，而將這些不同對抗力量所擠壓出的不確定性都歸咎於移民或難民這群陌生人身。我們看到，右翼民粹政黨以人民之名而將他者問題化，具有一個重要的功能，亦即化約一般人民在晚期現代性中面臨的多元且複雜的不確定性及風險。換言之，問題化他者是簡化個人及社會內部問題的方便且有效手段。Bauman 在《廢棄社會》一書中甚至指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各國執政黨過去甚至或隱或險地動員或允許一般民眾以維護社群安全及公民權利之名，行排斥移民或少數族群之實，藉此轉移社會內部的矛盾性（古蕾、胡欣譯，2018，頁 128-129；Bauman, 2006: 27）。對於當下或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咎責具體對象上凝聚到易於辨識的移民或難民身上；在時間上，希望的所在不是投向開放性的未來，而是沉浸在浪漫化的過去美好時光。

（三）民粹主義的希望政治

民粹主義利用不確定性夾帶的負面情緒，以人民之名進而主張反建制及反移民的政策與訴求，鞏固種族—民族主義的本真想像（Rydgren, 2007: 242; Lubbers, 2019）。民粹主義動員的不只是恐懼，還承諾希望，將消除不確定的希望寄託在「另類」的選擇上，正如德國右翼民粹政黨「另類選擇黨」所暗示的那樣。在這個意義上，學者 Katsambekis（2017）認為，民粹主義儘管在後民主的社會中具有反民主特質及負面意涵，然而，我們還是不能忽視它對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問題提出尖銳的質疑與挑戰。民粹主義就其出現的脈絡，不只是作為一個民主赤字或是社會問題，它很弔詭地也作為一種降低社會不確定性所引起的焦慮、不安、憤恨及不穩定的解方。換言之，右翼民粹主義以人民之名重新界定身分認同，化約多重問題的複雜性，也簡化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企圖透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訴求，將多重且相互交織的不確定性，再度帶入單一的確定性之中，也就是美好的國家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右翼民粹主義不只是一個有待我們克服的問題根源，更是面對問題的可能回應與解方，只不過，它引發更多的問題與爭議。³

時間並非物理性的，而是具有社會性的意義；時間更不是一種線

³ 感謝評論人之一指出，區域整合是現有的治理秩序與趨勢，代表了某種確定性，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普遍認為這種治理模式帶來不確定性，因而出現反整合、反歐盟及反移民的主張，轉而以懷舊的政治秩序「克服」不確定性，例如英國的脫歐公投。然而，這種解方卻是遠離現有治理模式的確定性，迎向新的不確定性（即使其承諾過去美好的確定性），因此，弔詭的是，右翼民粹主義及其支持者看似要克服不確定性，卻反而可能是追求或陷入新的不確定性當中。

性的前進發展，而是隨著當下的現況回溯過去，設想未來的一種偶然性的時間排序連結，並在這樣的重塑中擬定可能的行動方案（Mead, 2002）。當對下及未來的不確定性的焦慮，可以被解釋為渴望擁有可預測、可控制及值得信賴的穩定世界秩序與價值體系。這種對當下及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轉而將希望寄託在懷鄉式的鄉土或是國家所承載的過去美好時光中。對現代國家制度治理及建制派的失望，並不同於對國家全然的否決，反而是要回復本質上起源的國家形式。民粹主義提供的另類選擇尤其著重國家扮演的「理想國度」（heartland）角色，那是「一個想像的領地……，喚起了值得捍衛的那種生活及那些品質，……那個地方體現了日常生活的積極面向」（Taggart, 2000: 95）。透過呼喚過去浪漫化、反歷史的傳統國家，投射到未來的規劃與期望中。於是乎，民粹主義便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連結起來，而具有排外的特徵。民粹主義大膽允諾穩定的未來，為複雜的問題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並將所有具有清楚可辨識的不同生活風格的人，尤其是涉及到少數族群、移民或難民，視為社會失序、傾毀及不穩定的主要原因。然而，這種懷鄉式的烏托邦寄託，正如 Bauman（朱道凱譯，2019）談及在後現代的不確定性浪潮中希冀「重返烏托邦」的努力，不僅是一種徒勞，也可能重回威權國家的路徑。

四、面對不確定性的另類選項

Giddens 在《第三條路》一書中提到當政黨無法在理論及實踐上處理不確定性的問題，政權或主權都會失去合理性，「失去原有確定性，號稱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創造的政策是不堪一擊的」（鄭武國

譯，1999，頁3）。民粹主義的興起表達一件事情，人們覺得透過排除外國人、移民或難民，並重建傳統的、由純潔的人民組成的國家，是對抗晚期現代性在社會各層面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的有效做法，是恢復安定生活的重要手段與方法。重返國族的烏托邦，一切都會恢復正常。我在上面從「民粹主義興起」的現實出發，分析形塑現在狀況的種種力量，儘管從上述的分析中，我指出民粹主義本身可被視為一種解決不確定性的「解方」，透過煽動人們對於移民或難民的恐懼，並將希望寄託在浪漫式的國族想像。這麼做並不是要去合理化民粹主義的存在，而是要抱持著一種批判的關懷，思考是否有其他替代可能性。當然，這樣的思考跟具體的政策規劃與方案，還存在很大的落差，此外，我們也難以找到單一的另類方法來解決不確定的處境與情緒感受（Bauman, 2016: 19）。然而，這種尋找另類可能性的努力，仍然值得嘗試。Iris Marion Young 曾經對此下過絕佳的註解：「社會的改變源自政治，而不是哲學。然而，理想是解放政治中關鍵的一步，因為我們總是把給定當成是必要的，而理想驅散了這樣的假定。它們提供了批判給定的立足點，啟發我們對於另類選擇的想像」（Young，陳雅馨譯，2017，頁421）。Bauman 曾指出，若要消解對移民的道德恐慌與排斥，坦然面對來到「我們門前的陌生人」，需要不間斷地對話以增進相互的理解（Bauman, 2016: 113）。除此之外，以下我將提出幾個可能的另類替代選擇性。

首先，儘管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民粹主義的態度不必然與客觀的經濟物質處境相對應，但我們仍不得不重新思考經濟與社會關係，隨著經濟所得的兩極化及知識經濟的到來，如何公平正義地將（客觀及情感上受到威脅的）邊緣者一同納入共享經濟成長與政策參與的過程，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近來有許多學者提倡「涵容性的成

長」(inclusive growth)，這是指將被排除者納入一同參與政治與經濟的過程，透過對失業者、年輕人及低技術者進行「社會投資」，培養個人能力，使其在不同生命歷程中能夠順利轉銜進入職場，增加社會參與 (Smyth and Deeming, 2016)。涵容性成長認為，增加這些被排除者進入平等參與政治及經濟制度的機會，可以促成解放政治，有效地熄滅民粹主義的氣焰 (Getahun, 2017)。其次，另一個可能的另類社會經濟模式則是基本收入。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個建立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激進所得重分配方案 (Van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許瑞宋譯, 2017; Standing, 陳儀譯, 2018)，同時能夠解決過去社會政策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例如：避免被取消福利資格而不積極尋找工作工作的「失業陷阱」，或是在工作福利的制度下，屈就於不斷尋找令人感到污辱及失尊嚴的「就業陷阱」。

當代社會生產技術不斷更新，人工智慧產業的發展及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許多勞工面臨了技術過時而被淘汰及取代的風險，陷入不穩定及不安全的勞動狀況。知識與資本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分配極度不均加劇不確定性的狀況，展現當今社會分配系統的失效與失功能。對現況不滿及對未來風險的擔憂極有可能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的溫床，「隨著當前貧富不均的程度呈倍數成長，民怨當然也加速沸騰。社會上的憂慮、混亂、疏離和憤怒等情緒交雜，正醞釀一場『完美風暴』，而民粹主義政治人物有從中得到操弄恐懼的大好機會，他們順勢引發民眾支持許多曾在第一個鍍金時代後造成許多遺毒的諸多危險主張」(Standing, 陳儀譯, 2018, 頁 10)。若我們不嚴肅思考一套更具公平正義的分配制度的話，那麼「這個世界朝極右傾斜的力量將會更強大。」這是因為「如果一個社會上存在權力、地位與財產所有權的整體分配不均，但又假裝它擁有形式上的平等，激進的憤恨種子就

會開始萌芽。匱乏、屈辱、忌妒、疏離與社會缺乏法紀等感受，將會醞釀不健康的政治活動，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聲承諾要『翻轉現況』的政治人物」(2018，頁 106-107)。

作為一種達到實質自由與解放的工具，基本收入的共同訴求是指，必須以現金來發放給付，並且符合三個基本特性：完全以個人權利為基礎、人人有份及義務全免。儘管基本收入常被批評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想像，可能導致道德及福利依賴風險、經濟無法負荷等現實問題，然而，作為一種理想，它重新思考經濟基本保障與工作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不工作的倫理與風氣（林耕漢，2020），回應社會或世界共同資源的利用與分配的議題，以達到個人解放自由的目的。⁴

最後，除了經濟所得重分配及涵容性成長的經濟議題，誠如許多肯認差異理論所指出的，除了經濟所得分配的議題外，身分肯認差異的政治也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面向（Honneth/Fraser/Young）。對於差異的肯認，除了具有文化肯認的多元面向，也具有倫理道德的基礎。這一波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引起對多元文化主義及性別與種族等身分政治的反思，進而產生這樣的質疑：這是多元主義及身分政治失敗的表徵嗎？當然，這不必然意味多元主義與身分政治訴求的無效，然而更近一步地分析民粹主義對於身分政治的「憤怒」，理解這

⁴ 感謝評論之一指出基本收入與民粹主義的複雜關係。在文中，我引用基本收入倡議者 Standing 的看法，認為基本收入可平緩所得不斷擴大引起的憤怒與焦慮，將有助於澆熄民粹主義的火焰。但基本收入以公民身為號召，強調個人權利、人人有份、免義務，這反而可能強化對他者的排斥，有「提油救火」的危險。實證研究確實也顯示出這樣的危險，正如 Bay and Pedersen（2006）的研究指出，挪威選民普遍支持基本收入的理念，然而，若將移民也納入基本收入的給付對象時，支持度便明顯下降。

種憤怒背後的解釋模式，將有助於我們釐清未來可能的方向。消逝的熟悉感、安全感及失整合，在情緒上引起民粹主義的憤怒，這種情緒必須有具體的發洩對象，投射在移民及難民這些陌生人身上。以「真正的人民」之名，人民被塑造為移民及難民大量移入的受害者；這些人不屬於國家或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人民卻被迫要肯認他們是自身的一部分。決策菁英推動的去國族疆界、多元文化與多種族的政策，「被理解為社區、社會及國家結構的萎縮，是致命的不穩定的衰敗故事」(Pitum, 2020: 103)，對自身文化受到威脅而感到憤怒或憂心。

從民粹主義興起的現實來看，顯然，多元主義及身分政治的說詞顯得疲乏、不具吸引力，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達到差異共存，且仍能具有信賴感地與眾多陌生人共同生活，與眾多意義選擇性共存？Young 反對社群或共同體 (Gemeinschaft/community) 的訴求，因為「共同體社會被鄉愁式地重構為一個失去的起源社會」，並且將城市社會 (Gesellschaft/society) 視為「表達了所有社群重現欲排除的那些反面價值」(Young, 陳雅馨譯, 2017, 頁 393)，體現出失序、傷風敗俗、犯罪及危險。反之，她主張一種以城市生活作為規範性理想的共同生活基礎，將都市性視為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物質基礎。都市中的社會群體不是依靠血緣或種族的連結，而是彼此真實交往互動的社會關係，是會流動及更新的，是「互動、意義及親近性的關係性結果；人們是透過這些互動、意義及親近性而彼此認同」(2017, 頁 379)。在這種社會群體中，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與關係中建立相對穩定的連帶與互惠關係，然而，城市生活不只侷限於此，我們必須體認到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許多（包括與自己同種族的）陌生人在場，且依賴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陌生人共同建構的關係網絡而維持的，即使在市郊及小城鎮的社會生活都是被編織到陌生人共同建構的網路

中。與陌生人共同生活的事實，不必然共享社群共同體的相互認同與互惠關係，但卻是存在彼此互賴的關係，部分交織地具有共同的問題及利益。

除此之外，現代自我分屬不同社會群體，彼此可能相互矛盾對立，體現為一種混雜的存有性質。在過去，這被視為分裂、不統一且充滿危機，但現在卻是一種生活事實。儘管這也可能陷入 Bauman 所討論的液態社會的不安及不確定感，但現代人必須學習面對複雜性的技巧，並隨著不同情境來調整相關的行動或解釋框架。對於清晰可辨的移民與難民的排斥，事實上也凸顯了個人感到無法掌握及影響周遭世界的無力與無能感，陷入受他人宰制以及自身失去決定權的雙重意義失落感，也因此這樣的世界無法被體驗為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這是整個社會漸趨複雜，無可相互化約的必然結果。然而，當我們將重點擺放在由社群或國家所規劃的懷鄉式的意義與價值整體時，很容易落入了本質式的靜態起源想像，進而忽略社會群體的關係是會變動且更新，以及現代生活處境的分化。在當代社會中，過去同質、靜態的連帶關係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共同利益或問題進行互動的親近性社會群體，這具有形成相對穩定、共享價值的共同體之潛能，但是，城市生活在另一面向也得正視這樣的事實，也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運作是大大依賴陌生人共同建構的關係網絡。這兩種遠近連帶的交互作用，或許可以回應現代人面對差異漸繁、無可化約的生命處境中，既渴望信任與安定，又保有差異多樣的矛盾情緒。

五、結論

在本文中，我以不確定性的概念來描述一種可以是社會心理的主觀情感知覺，亦可能是客觀社經地位的殆危狀況。在時間上，不確定性是一種對現況及未來的不安與焦慮的情感紀錄；在對象上，則是將怨恨投射在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人口廢棄物」，尤其是易於指認的移民、難民及尋求庇護者身上。在重建希望的過程中，在時間上，民粹主義返回過去穩定、安全及美好的時光；在對象上則建構一個由純潔、真正的人民所組成的理想國度及國族的烏托邦。

作為解決不確定性的解方，民粹主義因其具有怨恨及暴力的極權傾向而受到嚴厲批評，但即使民粹主義的興起被視為一種民主的威脅，是情感壓過理智的大眾鴉片（Kenny, 2017），不可否認地，它的訴求吸引許多選民將其視為對現狀不滿及降低不確定性的解方。它引起我們重新審視現在的狀況，弔詭的是，「這一探索若沒有痛苦的怨恨的威脅，可能就不會開始」（da Silva and Vieira, 2018: 27）。若我們不接受民粹主義的解方，那麼，人民在客觀面臨或主觀感受到的不公平、被忽視的狀態，到底要如何投射在理想未來的具體執行上？在政治層面上，建立有效且公開透明的機制，讓菁英決策與民眾意見間具有同步的對話及參與。在經濟上，經濟資源與所得的公平分配，向來是一個深重關注的議題，而在當代則更凸顯重啟商榷的必要性。最後，當我們重思解決不確定性的另類可能性時，不得不從一個社會現實出發，亦即現在社會及個人逐漸差異分化，尋求一個在所有面向具有同一性的共同體社群，是一個遠離生命經驗的提案。然而，如何在現代人既渴求安全，也憧憬變化差異的兩難情感間取得平衡，藉以發展出新的關係倫理學，將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齊格蒙·包曼

- 2018 《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古蕾、胡欣譯。台北：麥田。
- 2019 《重返烏托邦》，朱道凱譯。台北：群學。

Bauman, Zygmunt

- 2018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trans. by Lei Ku and Hsin Hu. Taipei: Rye Field.
- 2019 *Retrotopia*, trans. by Tao-Kai Chu. Taipei: Socio.

安東尼·紀登斯

- 1999 《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鄭武國譯。台北：聯經。

Giddens, Anthony

- 1999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trans. by Wu-Kuo Cheng. Taipei: Linking.

蓋伊·史坦丁

- 2018 《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陳儀譯。台北：臉譜。

Standing, Guy

- 2018 *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trans. by Yi Cheng. Taipei: Lienpu.

菲利普·范·帕雷斯、楊尼克·范德波特

- 2017 《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許瑞宋譯。台北：衛城。

Van Parijs, Philippe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2017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trans. by Jui-Sung Hsu. Taipei: Weicheng.

艾莉絲·楊

2017 《正義與差異政治》，陳雅馨譯。台北：商周。

Young, Iris Marion

2017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trans. by Ya-Hsian Chen. Taipei: Bussiness Weekly.

林耕漢

2020 〈論基本收入：非工作的風氣〉，《歐美研究》，50 卷 3 期，頁 571-611。

Lin, Keng-Han

2020 “Towards Basic Income: On the Non-Working Ethos,”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50(3): 571-611.

謝靜

2017 《奧菲的福利國家危機理論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

Sie, Jing

2017 *ao fei de fulli guo jia wie ji li lun yan jiou*.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外文部分

Bauman, Zygmunt

1995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2001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 2002 *Society under Siege*. Cambridge: Polity.
- 2003 *Liquid Love*. Cambridge: Polity.
- 2005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 2006 *Liquid Fear*. Cambridge: Polity.
- 2016 *Strangers at Our Door*.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ygmunt and Mark Haugaard

- 2008 “Liquid Modernity and Power: A Dialogue with Zygmunt Bauman,” *Journal of Power* 1(2): 111-130.

Bay, Ann-Helén and Axel West Pedersen

- 2006 “The Limits of Social Solidarity: Basic Income, Immigrat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 *Acta Sociologica* 49(4): 419-436.

Beauzamy, Brigitte

- 2013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Front National to Electoral Prominence: Multi-faceted or Contradictory Models?” in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and Brigitte Mral eds.,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London: Bloomsbury, pp. 177-190.

Beck, Ulrich

- 1998 *Was ist Globalisierung? Irrtümer des Globalismus-Antwort auf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eck, Ulrich, Wolfgang Bonß and Christoph Lau

- 2001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Fragestellungen, Hypothesen, Forschungsprogramme,” in Ulrich Beck und Wolfgang Bonß eds.,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Überlegungen zur Transformatio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p. 11-59.

Berbuir, Nicole, Marcel Lewandowsky and Jasmin Siri

- 2015 “The AfD and its Sympathisers: Finally a Right-Wing Populist Movement in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24(2): 154-178.

Bergmann, Knut, Mattias Diermeier and Judith Niehues

- 2017 “NRW-Wahl: Nur wenige AfD Wähler arbeitslos,” *IW-Kurzberichte* 51. Köln: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67608/1/894777343.pdf>

Betz, Hans-Georg

- 1990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ight-Wing Radicalism in West Germany,” *Comparative Politics* 23(1): 45-60.
- 1993 “The Two Faces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a,” *The Review of Politics* 55(4): 663-685.

Bitzan, Renate

- 2017 “Research on Gender and the Far Right in Germany Since 1990: Developments, Finding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ichaela Köttig, Renate Bitzan and Andrea Petö eds., *Gender and Far Right Politics i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pp. 65-78.

Bobba, Giuliano

- 2019 “Social Media Populism: Features and ‘Likeability’ of Lega Nord Communication on Facebook,”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18: 11-23.

Bohmann, Ulf, Henning Laux and Hartmut Rosa

- 2018 “Desynchronization and Populism. A Time-Sociological Attempt on the Democracy Crisis Using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70: 195-226.

Boros, Tamás and Gergely Laki

- 2018 *The State of Populism in Europe*. Brussels: FEPS and Policy Solu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feps-europe.eu/attachments/publications/web_state%20of%20populism%20in%20europe%202018.pdf

Bronk, Richard and Wade Jacoby

- 2020 “The Epistemics of Popu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Available at <https://deliverypdf.ssrn.com/delivery.php?ID=34911511506408901208408711308309406404606304804609506502812607212106700402300402910810301304204706012205502112208201700012000611605402103008200087066127115121079101086055022027115010110101106079083072068026098077104103124012104076085098116119084090126&EXT=pdf&INDEX=TRUE>

Cairncross, Frances

- 1997 “Is the British Welfare System Sustainable?” in Peter

Koslowski and Andreas Føllesdal eds.,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ory and Reform of Social Policy*. New York: Springer, pp. 9-20.

Capelos, Tereza, and Nicolas Demertzis

2018 “Political Action and Resentful Affectivity in Critical Times,” *Humanity & Society* 42(4): 410-433.

da Silva FC, Vieira MB

2018 “Popu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 *Thesis Eleven* 149(1):10-30.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

2011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ger, Maureen A. and Sarah Valdez

2014 “Neo-nat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1): 115-130.

Elchardus, Mark and Bram Spruyt

2016 “Populism, Persistent Republicanism and Decli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pulism as a Thin Ideolog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1(1): 111-133.

Elmgren, Ainur

2018 “The Double-edged Sword: The Political Appropri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3(3): 320-341.

Enns J. and Laurenz

2018 “Welfare Chauvinism in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latforms:

The Role of Redistributive Justice Principle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52(1): 293-314.

Fangen, Katrine and Inger Skjelsbæk

2020 “Editorial: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and the Far Right,”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21(4): 411-415.

Getahun, Saleamlak Fentaw

2017 “Review of Inclusive Growth and other Alternatives to Confront Authoritarian Populism,” *Problems of World Agriculture/Problemy Rolnictwa Światowego* 17(1827-2018-096): 78-84.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2004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98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Politische Essay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mbauer, Verena and Anja Mays

2018 “Wer wählt die AfD?—Ein Vergleich der Sozialstruktur, politischen Ein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zu Flüchtlingen zwischen AfD-WählerInnen und der WählerInnen der anderen Partei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12(1): 133-154.

Heitmeyer, Wilhelm

- 2010 “Disparate Entwicklungen in Krisenzeiten, Entsolidarisierung und Gruppenbezogene Menschenfeindlichkeit,” in Wilhelm Heitmeyer ed., *Deutsche Zustän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p. 13-33.

Heizmann, Boris, Alexander Jedinger and Anja Perry

- 2018 “Welfare Chauvinism,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Asylum Seeker ‘Crisis’,” *Societies* 8(3): 1-17.

Hermans, Hubert J. M. and Giancarlo Dimaggio

- 2007 “Self, Ident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A Dialogical Analysi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1(1): 31-61.

Ibsen, Malte Frøslee

- 2019 “The Populist Conjuncture: Legitimation Crisis in the Age of Globalized Capitalism,” *Political Studies* 67(3): 795-811.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 16-26.

Jørgensen, Martin Bak and Trine Lund Thomsen

- 2016 “Deservingness in the Danish Context: Welfare Chauvinism in Times of Crisi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36(3): 330-351.

Junge Matthias

- 2012 “Georg Simmel,” in Frank Eckardt ed., *Handbuch Stadtsoziologi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pp. 83-93.

Katsambekis, Giorgos

- 2017 “The Populist Surge in Post-Democratic Times: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88(2): 202-210.

Kenny, Michael

- 2017 “Back to the Populist Future? Understanding Nostalgia in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2(3): 256-273.

Keskinen, Suvi

- 2016 “From Welfare Nationalism to Welfare Chauvinism. Economic Rhetoric, Welfare State and the Changing Policies of Asylum in Finland,” *Critical Social Policy* 36(3): 352-370.

Kinnvall, Catarina

- 2019 “Populism,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nd Hindutva: Modi and the Masculinization of Indian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2(3): 283-302.

Klein, Naomi

-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Toronto: Knopf.

Koppetsch, Cornelia

- 2013 *Die Wiederkehr der Konformität. Streifzüge durch die gefährdete Mitt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 2017 “Aufstand der Etablierten? Rechtspopulismus und die gefährdete Mitte.” Available at <https://soziopolis.de/beobachten/kultur/artikel/aufstand-der-etablierten/>

Köster, Manuel

- 2018 “Alternative Fakten? Die sprachliche Konstruktion des Faktizitätsanspruchs rechtspopulistischer historischer Narrativ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didaktik* 17: 72-86.

Kováts, Eszter

- 2017 “The Emergence of Powerful Anti-gender Movements in Europe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Michaela Köttig, Renate Bitzan and Andrea Pető eds., *Gender and Far Right Politics i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pp. 175-189.

Lebow, Richard Ned

- 2016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ngfeld, Holgar

- 2017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ine Partei für Modernisierungsverlierer?”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69: 209-232.

Lubbers, Marcel

- 2019 “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Sets the Radical Right and Its Electorate Apart from the Rest? Pride in the Nation’s History as Part of Nationalist Nostalg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5: 449-466.

Lubbers, Marcel and Peer Scheepers

- 2001 “Explaining the Trend in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Germany 1989-1998,”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4): 431-449.

Luo, Chih-Mei

- 2017 "The Rise of Populist Right-wing Parties in the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Review* 25(3): 406-422.

Mead, George Herbert

- 2002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New York: Prometheus.

Morelock, Jeremiah ed.

- 2018 *Critical Theory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Mudde, Cas

- 2002 *Th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 2018 "How Populism Became the Concept That Defines Our Age," *The Guardian* 22.

Mudde, Ca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 2018 "Studying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3): 1667-1693.

Muis, Jasper and Tim Immerzeel

- 2016 "Radical Right Populism," *Sociopedia. isa* 1-18.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Jasper-Muis/publication/323955354_Radical_right_populism/links/5abeac730f7e9bfc0459aa3b/Radical-right-populism.pdf

Müller, Jan-Werner

2016 *What Is Populis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ünkler, Herfried

2010 *Mitte und Maß. Der Kampf um die richtige Ordnung.* Berlin: Rowohlt.

Pitum, Lorenz

2020 *Populistische Wut. Deutungsmuster des modernen deutschen Rechtspopulismus.* Ph.D. Dissertation,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Priester, Karin

2012 *Rechter und linker Populismus. Annäherung an ein Chamäle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Reith, Gerda

2004 "Uncertain Times: The Notion of 'Ris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Time & Society* 13(2-3): 383-402.

Rippl, Susanne and Christian Seipel

2018 "Modernisierungsverlierer, Cultural Backlash, Postdemokrat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70(2): 237-254.

Rippl, Susanne and Dirk Baier

2005 "Das Deprivationskonzept in der Rechtsextremismusforsch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57: 644-666.

Rodrik, Daniel

2018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1): 12-33.

Rydgren, Jens

2007 “The Sociology of the Radical Righ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41-262.

Salmela, Mikko and Christian von Scheve

2018 “Emotional Dynamics of Right-and Left-wing Political Populism,” *Humanity & Society* 42(4): 434-454.

Schaefer, Dagmar, Jürgen Mansel and Wilhelm Heitmeyer

2002 “Rechtspopulistisches Potential. Die saubere Mitte als Problem,” in Wilhelm Heitmeyer ed., *Deutsche Zustände. Folge 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p. 123-136.

Schmidt, Volker H.

2017 “Disquieting Uncertainty. Three Glimpses into the Fu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Futures Research* 5(1): 1-10.

Schroeder, Ralph

2020 “The Dangerous Myth of Populism as a Thin Ideology,” *Populism* 3(1): 13-28.

Schwinn Tomas

2020 “Wertsphären und Lebensordnungen,” in Hans-Peter Müller and Sigmund Steffen eds., *Max Weber-Handbuch*. Stuttgart: J. B. Metzler, pp. 189-192.

Smyth, Paul and Christopher Deeming

2016 “The ‘Social Investment Perspective’ in Social Policy: A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50(6): 673-690.

Spier, Tim

2010 *Modernisierungsverlierer? - Die Wählerschaft rechtspopulistischer Parteien in Westeuropa*. Wiesbaden: Springer VS.

Stanley Ben

2008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1): 95-110.

Steele, Brent J. and Alexandra Homolar

2019 “Ontological Insecur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2(3): 214-221.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Vogel, Berthold

2009 *Wohlstandskonflikte. Soziale Fragen, die aus der Mitte kommen*.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Wodak, Ruth

2015 *The Politics of Fear: 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Zürn, Michael and Pieter de Wilde

2016 “Debating Globalization: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s Political Ideolog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1(3): 1-22.

Abstract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s a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that we cannot ign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populist turn” in Europe by link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factor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ty. It argues that late modern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nxiety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oncerning the objective material basis of on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instability. Populism transferred this intertwined uncertainty into hostility toward immigrants and a glorified image of the past nation-state.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ism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which illustrates how populism simultaneously incites fear and gives hope to secure its power. Then, this article will reflect on alternative options for facing uncertainty and conclude.

Keywords: populism,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hope

Long Summary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s a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that we cannot ign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populist turn” in Europ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ty. Late modernity is full of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objective material status and embedded in the socio-psychological state of late modernity as a subjective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the individual. Populism reduces the multiple uncertainties to hostility toward immigrants while constructing a fond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e definition of populism is very diverse and pluralistic, which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y of considering it as a simple and homogeneous concept. Nonetheless, most studies point to populism as a political-social-cultural program that takes the people as its aspiration by treating the corrupt elite and the pure masses as two opposing groups. In addition, contemporary populist parties constitute a party family of neo-nationalism. This party family criticizes excess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supports an anti-globalization stance, and exhibits anti-immigrant and anti-refugee xenophobic sentiments.

The existing populist literature can divide into two categories: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The form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populism. The latter measures the populist attitudes of voters and explores who has more affinity with populism. There are two mai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demand-side research: the modernization loser and the cultural threat approach. But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to these studies.

First, studies tend to attribute populism to a single factor; second, while noticing the populist emotion of fear and anxiety, they tend to attribute this sentiment to the objective economic status of voters. However, a growing body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no clear pi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populist attitudes (Lubers and Sheepers, 2001; Elckhardus and Spruyt, 2016; Lengfeld, 2017; Bergmann et al., 2017).

Both the supply side of populism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dysfunc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demand side (the modernization loser and cultural threat) involve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phenomena. And uncertainty is not just a reflec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extends to anxiety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predict and control the future. Beauzanmy (2013) urges that to properly articulate and understand the growing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t demands, we need to go beyond a simpl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losers or cultural anxiety on the demand side and analyze the supply sid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go beyond the one-line view of populist attitudes caused by objective and precarious life situations.

Given thi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ty to illustr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populist turn” in Europe. Bronk and Jacoby (2020) have applied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material vulnerability and populism. 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I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certainty and populism

in terms of both individual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objective social-economic status.

By so do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emotional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mong the precarious and the middle class. Furthermore, it illustrates how anxiety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link to anti-elite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state is seen nostalgically as a utopia, a solution to deal with the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 in modernity. It illustrates the loss of stability and homogeneity, increasing complexity, leading towards fragmentation of life situations and identities (Bauman, 1995). Uncertainty does not only refer to the precariousness of individual human conditions. It can also illustrate psychological unease and anxiety and inability to reconstruct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meaningful whole; it refers not only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also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and is embedded in the network of changes in individual lives or social structures (Schmidt, 2017). This uncertainty is mobilized by populism in its political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to develop a politics of fear and a politics of hope.

The identity politics and anxieties fomented by populism draw a line between the immigrant and the other by repositioning the individual, who suffers from existential uncertainty, in a collective image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identifiable visibility, migrants and refugees are blamed as scapegoats for the harmfu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s “clear and visible static targets of excess suffering” (Bauman, 2018: 130).

They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e breakdown of order” (Bauman, 2016: 15), which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s of fear.

Populism not only mobilizes fear but also promises hope, pinning the hope of eliminating uncertainty on “alternative” options. When the anxiety of uncertainty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iscloses a desire for stable world order and value system, this anxiety and the fear of migration turns to the hope of a nostalgic homeland or the good old days of the heartland that the nation embodies. However, as Bauman (2019) discusses, it not only is a futile effort to “return to utopia” in the wave of postmodern uncertainty, but may also revert to the path of authoritarian states.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populism can be seen as a “solution” to uncertainty, inciting fears of immigrants or refugees and pinning hopes on a romanticized national imagination, which is not to rationalize the existence of populism but instea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for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Bauman recommends that to dispel moral panic and rejection of immigrants and be open to the “stranger on our doorstep”, a continual dialogue is needed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addition, there are other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for facing rising uncertainty. The first is the importance of inclusive growth, which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the excluded to ent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in turn, leads to a politics of liberation that effectively extinguishes the flames of populism. The second is the basic income, a radical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designed to promote substantial freedom for individuals and reduc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profiteers and

the vulnerable. Finally, there is the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recognizing that a mixed state of existence is a contemporary fact of life. Of cours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single solution to the uncertainty of situations and emotional feelings, but this does not prevent us from thinking about alternative options.

